

审美现代性与中国经验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专题讨论会综述

盛 丹

(上海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240)

【摘要】2011年4月在首届“中英马克思主义美学双边论坛”中,有关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的专题讨论,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兴趣。讨论会围绕“中英审美现代性的差异”这一主题,从《讲话》的现实意义、产生的时代背景等多方面进行对话,通过对民间文化、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不同概念的分析,从不同的语境下探讨了这样的一个文本为什么会具有持久的生命力等问题。

【关键词】《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化领导权;中国经验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04(2012)01-0044-04

2011年4月23—26日,由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和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艺术、历史与文化学院联合主办的首届“中英马克思主义美学双边论坛”,在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隆重举行。论坛组织了多种形式的学术研讨会,其中有关毛泽东于1942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的专题讨论,受到了众多学者的关注。除了来自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知名学者外,还有来自美国、澳大利亚、俄罗斯等国的数位著名学者以及来自国内著名高校的数十名学者参加本次论坛。25日上午,围绕《讲话》进行的专题讨论由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王杰教授主持,会议持续一个半小时,讨论激烈,多方观点均有呈现,现摘录发言、观点综述如下:

一、《讲话》在当今时代具有怎样的意义

《讲话》是一个有世界影响的文学理论和美学文本,在对《讲话》的理解方面,中国学者和英国学者有许多差异,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来自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学者 Mike 首先针对《讲话》,提出了四个问题,希望得到中国学者的回应。第一个问题,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国是如何产生文艺政策的?40年代的文艺政策在21世纪具有怎样的现实性,对现代文艺政策有何意义;第二,毛泽东对于人民大众审美问题的重视性问题。毛泽东的《讲话》中提到“文艺作品是为

收稿日期:2011-08-14

作者简介:盛丹(1986-),女,湖南人,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文艺学研究。

大众服务”，这句话没有体现艺术作品是由谁创作的，这是为什么？第三个问题，精英艺术和大众艺术、反动艺术和革命艺术，毛泽东所讲的这两种关系也会在政治和艺术之中有所体现。这三者的关系来自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第三立场，毛泽东所讲的精英和人民艺术在西方对应着大众艺术（master culture），在英国，人民大众所创作的艺术是民间艺术（folk culture），与媒体所创作的大众艺术有区别。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文化产业为我们带来了新的问题，这种西方所谓的大众艺术比较重视生产和技术上的精致，有美学上的理念，这就产生了文化被景观社会所代替。第四个问题，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到“从以前的文化中提取积极因素”，对整个人类社会、传统社会的积极因素是否具有普遍性？以及这种普遍性的价值和艺术创作之间的关系。

另一位英国学者 Justin 是采用现代主义的方法来研究《讲话》，他认为“文化艺术很容易与大众交流”，这一观点是错误的。艺术家创作往往没有重视艺术素材的本质性，也就是说关于艺术创作的特性都被创作者忽略了。他们的工具和政治斗争都是相对独立的，材料本身与艺术家的阶级、社会背景无关，而是与创作产业产生的整个过程有关。现在不应该简单地谈真正自由的艺术家，艺术创作从来都不是自由的。现代主义对艺术的创造，对文化的创造的影响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如何利用这个理论去研究 21 世纪当代艺术理论值得大家思考。

二、《讲话》发表的社会时代背景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王杰教授认为，《讲话》在中国审美现代性中是一个关键性的文本，它主要谈论的是社会与美学理论、艺术三者之间的关系。写于 1942 年的《讲话》是处在 20—30 年代的美学论争与 80 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之间的一个文本，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中，《讲话》起了很大的作用。中国的新民主主义胜利与《讲话》密不可分，事实上，讲话提出了文化领导权问题，影响了中国的文化政策，中国共产党通过《讲话》制定了一系列的文化政策，成功地赢得了新民主主义文化领导权和中国革命的领导权。王杰教授指出，《讲话》最重要的东西是根据中国现实经验，从文化资源中找到积极的东西，创造一种新的文

化将大众组织起来，投入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去。《讲话》在 40 年代发表，相隔不到十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就取得了胜利，他认为这是值得思考的现象。

厦门大学中文系俞兆平教授提出疑问，在《讲话》中为什么没有直接沿用苏联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内容？他解释到，苏联的整风运动让毛泽东意识到中共党内的领导权争夺问题。通过延安整风运动，王明在理论上彻底失败，毛泽东胜出，陈伯达等一批年轻的智囊团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样一个概念，并通过刘少奇在会上的宣扬，开始取代了王明的领导地位，在这一情况下，作为一个党的领导者，毛泽东对党对人民的领导是非常清晰的。《讲话》不仅是将文化方面的理论话语权树立起来，也确立了完整的毛泽东思想在文化方面的领导权，所以，《讲话》是遵循了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这样的一种传达模式，还有“为工农兵服务”这一语言形态。

三、对《讲话》中“文化”的不同理解

（一）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转变

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徐新建认为，《讲话》不是一个简单的文本，而是一个事件，也是一个运动，是在中国语境下产生的一个重要文件。如今回顾和研究《讲话》，要把它当做与古代社会中“签注”“眉批”及文人间的彼此唱和等文论形式极不相同的新型文类。徐教授指出，联系古代传统来看，中国文论的许多要义都包含在《讲话》里的，比如“文以载道”，这是它的意识形态背景。在国家控制意义上，就是“文武并治”，最高领导要控制国家必须同时利用武和文。因此《讲话》的目标是要控制“文化军队”。这一背景跟西方不一样。在西方的自由主义观念里，文艺活动是独立的，不能受政权掌控。其次，与近代中国比较，《讲话》中人民大众的倾向又与五四时期的“歌谣运动”相关联。歌谣运动提出的口号是“到民间去”，倡导知识分子加入“眼光向下的革命”，批判宫廷、推翻帝王将相和“精英”们的腐朽文化。所以从中国 20 世纪的“新文化运动”出发，《讲话》与“歌谣运动”是连在一起的。接下来又发生了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转变。一开始梁启超等人领导的是文学革命，也强调文学对革命的意义。但到毛泽东这里，“文学革命”变成了“革命文学”，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转

变,革命的对象和主体都发生了变化。在“文学革命”时期,文学还是主体,期待用革命的(激进)手段来改变文学;而到了“革命文学”之后,革命是主体,文学变成了工具。

徐新建教授还回应了 Mike 的问题。他区分了西方的三个文化, popular culture, folk culture 和 master culture。认为这三者的对立面都是“精英文化”(elite culture),但中国的结构有所不同。学术界一般把中国视为由官、士、民组成的三级社会,与此关联是官方文化、精英文化,然后才是民间文化。在这一点上,中国与西方的文化区分存在着很大不同。所以对于 Master culture 的汉语翻译就是一个难点。比如“好莱坞文化”,在西方概念中算是一个 master culture,但在中国看来,它却代表美国主流,因此被视为一种国家形象。中国人把好莱坞电影在全球泛滥看成是美国的文化侵略。其他还有《纽约时报》《国家地理》以及电视领域的“探索频道”等,在西方分类中或许都是 master culture,但在中国的语境下,则被视为官方。所以这些都是中西不同语境中,对于“文化”的不同理解。

(二)一种军事文化的表现

上海交通大学中文系汪济生教授首先对《讲话》有一个总的定性,他认为《讲话》不是一种纯粹的民间文化,实际上是军事文化的一种。当中国面临民族危亡,中国人民遭到压迫时,这种军事文化是正当的,但它也是短暂的。对于为什么《讲话》会有这么大的影响,这是因为《讲话》在抗日的军事任务完成后仍然在执行。中国的政治制度还在现代化,还没有完全实现现代化,所以他的文艺政策也不可能是现代化的。汪教授指出,将一个短暂的局部的政策变为整个国家唯一的政策这是一种错误的行为,而文艺的创作、文艺的自由实际上是民主思想的一个部分。如果我们的文艺没有自由,如果我们在长期的国家建设中也用军事的暂时的办法来管理,那么文艺的开放政策是不可能体现出来的。在这一文化背景下,我们可能产生类似《白毛女》这样的作品,但不可能有托尔斯泰这一类伟大的文学家,不可能有曹雪芹的《红楼梦》,也不可能有托尔斯泰《复活》,因为这些人到了延安,首先要改造,所以真正的一流的世界性的文学作品是必须扎根在深刻的艺术规律之中的。

(三)是艺术还是宣传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学者 David 强调艺术具有

独立性和自主性,艺术虽然不可能和政治分开,但是如何在与政治不分开的情况下,获得独立自主性,David 认为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英国学者 Theodore 从历史角度来分析,中国和俄国的革命都不是在资本主义发达的情况下产生的,而马克思主义的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产生社会革命这一理论,是在西欧的环境下产生的。西方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各派辩论中,并不仅仅是革命的失败而是随着资本主义国家产生一些新的东西,比如纳粹,以及反对纳粹的失败,这些都是在马克思主义学派的辩论问题之中。现在的中国已经加入了一个比较发达的全球化的体系,它的动力其实是来自于文化和经济的结构体系,所以在当代中国文化最紧急的问题是,如果中国没有自己的文化政策那它就会被被动地加入全球文化体系中。

(四)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

美国学者胡志德教授在谈到《讲话》发表的背景时,提到了对于大众文化与通俗文化的界定。他认为,精英中包括党内的一些人很不喜欢通俗的东西,通俗、民间、大众,这几个词没有一个清楚的分界,通俗都是贬义词,因为跟商业有关系。

徐新建教授在回应 Justin 的提问时,谈到如何在历史语境与国际语境下看待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问题。他认为在理解中国革命问题上,西方学者会有一些错位和误解。马克思主义是欧洲的历史产物,它所针对的是资本主义的缺陷和病根。如今资本主义的病根在全球范围内已日益明显,但中国的革命是一个民族和民主的革命,要解决的问题是从一个封建国家转向民主国家,同时要摆脱西方的控制。从孙中山到毛泽东,他们都在努力完成这个任务。因此,革命的初期主要吸纳的是列宁主义。而如今,马克思主义要解决的资本主义问题在中国出现了。中国正在加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国内的市场经济转型已带来分配不公与贫富悬殊等问题。面对这样的现实,马克思主义恰好是有效的,而不像有些人以为的那样已经过时。

四、结语

综上所述,参加本次会议的学者对《讲话》文本及其历史意义予以了高度重视。作为一个对中国的革命胜利及现代化建设都产生了重要作用的纲领性文件,《讲话》的影响不是单一的。除了强调党性原则,服从于自上而下的动员和宣传外,它也

具有站在人民立场一面, 提倡一种以人民大众为主体的表达形式, 确立的是一种人民的文艺。因此, 对于《讲话》的理解, 需要从两方面来看, 一是宣传性, 一是人民性。正如论坛闭幕式上, 曼彻斯特大学的 David 指出的那样, 时隔半个世纪, 中英

学者聚集上海, 再次从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化背景展开对《讲话》的讨论, 无疑是充满意味, 希望今后还有机会继续对话和研讨。

责任编辑: 刘承云

Aesthetic Modernity and China Experience

——The Review of the Lecture of *A Talk in the Forum on Literature and Art in Yan'an*

SHENG Dan

(School of Humanities,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0, China)

Abstract: In the first "Sino-British bilateral forum of Marxist aesthetics" of April, 2011, the special discussion subject of a talk in the forum on literature and art (for short A Talk) aroused the interests among the scholar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The lecture, taking the topic of the differences of aesthetic modernity between china and England and starting from A Talk's realistic significance and the origin background, makes an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t concepts of folk culture, common culture and elite culture and discusses the problems of the lasting vitality of the text in different context.

Key words: A Talk in the Forum on Literature and Art; culture leadership; China experience

(上接第 40 页)

以负责任的大国身份屹立于世界。近代以来民族主义的“国家叙事”制约了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及其对世界的应有贡献。如今举国上下都在讲中国, 不是“中国崛起”就是“中国梦”, 如果只朝这一条独路走, 既看不到世界又不关心人类是会出问题的。人类学的视野可以打破这一点, 激励我们把眼光置于整体的人类和人性的个体里, 从而使我们的观察与表述突破“国族叙事”的藩篱, 融汇到“个体的人”和“整体的人”中。

国族叙事的民族主义叙事和地方主义叙事。它是自我保护性、抵抗性的话语, 而文学人类学则既是本土的又是开放的。由此可见, 我认为从学理

上我们是有可能跨出去的, 只有在视野和学理方面都跨出去了, 我们方可回应西方世界的《国家地理》期刊、Discovery 频道以及《阿凡达》影片等那样的跨国叙事并与之对话。

注释:

- ① 此三项课题的成果可参见 Charles Bernheimer, e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the Age of Multiculturalism*,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5; 乔治·E·马尔库斯等:《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 中译本, 三联书店, 1998 年;《写文化: 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 中译本, 商务印书馆, 2006 年。

责任编辑: 刘承云

Egersis, Gratitude and Prospction

XU Xin-jian

(1.School of Humanities,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China

2. Institute of Folk Culture,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4, China)

Abstract: In 2011, the academic project of the theory and research method of China literary anthropology got the project approval of the nation social science fund, which marks that the researches of literary anthropology head from the border to the center. This article makes acknowledgement to the predecessors who approve the literary anthropology and points out the problems.

Key words: literary anthropology; academic environment; working type